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一丹随笔



一丹随笔

“漂”着的边缘人

一天，听见窗外传来一阵争吵声，往下一看，见一个北京小伙子正扭着一个收废品的外地人破口大骂，原来是俩人的三轮车错车时，北京小伙子的车被碰了一下。北京人嘴里骂着，手上揪着，那外地人却只是退缩地低声解释着。

在街头、地铁、公共汽车上，我经常看见这样的外地人。

他们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

说是乡下人吧，他们却常年生活在城里。干活，吃饭，甚至生儿育女；说是城里人吧，他们却没有城里的户口，而没有户口，似乎就缺少了应有的东西：尊严、待遇、平等。

中国人的户口有两种：农业和非农业。二元化，两大块，分得清清楚楚。据专家说，分得这么清楚的，全世界只有三家：中国、朝鲜、贝宁。森严壁垒，谈何流动呢？从五十年代实行这种户籍制度以后，人口几乎是固态的、静止的。

然而，这些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了，社会往前走，在农业和非农业户口两块之间，生出了边缘人。他们以极强的生命力发展着，眼见着边缘人越来越多，家里的小保姆，街上的服装摊，建筑工地的民工，流水线上的打工妹……一到春节前后，民工潮呈爆发之势，难以阻挡。

怎么了？无非是经济发展的要求；无非是铁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无非是那“看不见的手”在调度着几千万活生生的人口。

在北京南郊，浙江来京的“边缘人”已经形成村落，人称“浙江村”，我曾去那里采访，看到村里有人力“的士”，有诊所，有自由市场。在市场，买主是浙江人，卖主是浙江人，卖的东西也是浙江货，我在市场里竟恍然觉得自己不是在北京，而是在浙江的某一个小镇。在这里我遇到一户三世同堂、十几口人的大家庭，房子很临时，家具很临时，一家人那股安然劲儿却不怎么“临时”。最年长的老太太告诉我，她在浙江还有一个家，有户口，有房子，有地，只是人都出来了。我们离开浙江村时，一个北京当地人愤愤不平地悄悄对我们说：这些浙江人来北京赚钱，治安也不好了，卫生也糟透了，他们干嘛把家安在这儿！看来城里人虽然生活上离不开他们，但却并没有从感情上、心理上完全接纳他们。

他们的家，到底在哪儿呢？户口所在地是家？人在哪儿，哪儿就是家？都是又都不是，他们更多的是一种“漂”着的感觉。

这些“漂”着的边缘人就这样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生存着。家乡的家，空在那儿，好像就不是家了，城里的家，没有户口，不名正言顺，好像也不是家，这种状态，似乎用“漂”字更为确切。“漂”，使边缘人缺少一个健康环境，而“漂”又让管理者多么头疼！“漂”着的边缘人向我们提出了什么？

现有的户籍制度是不是该改一改呢？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二日

边缘人向我们提出了什么？

一封从山东寄来的信放在我的桌上，里面是一位观众的农转非户口的复印件。他说，这一纸户口值二千五百元。我有点大惊小怪，户口怎么可以买卖？而一位内行人告诉我说，这是户口买卖中最便宜的价儿，还有几千、上万的。现在户口买卖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农转非，恐怕是老外听不懂、不能理解的一个词，地道的中国特色。而政策性的农转非，商品化的农转非，更使得中国户籍有一种说不清看不透的感觉。

中国户口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不知决定了多少人的命运。有着非农业户口的人，自然多了一份高贵，多了一份优越，多了一份待遇，多了一份机会，这一切都能够世袭。而持农业户口的人们，以往则被牢牢钉在一块土地上，就业、上学、结婚，多少机遇都与他们无缘，这也世袭。一位朋友说，他的父亲一生有三次最高兴的时候：一次是一九四九年解放；一次是儿子考上大学，改变了农民身份，有了城里的户口；还有一次是落实政策，全家农转非。这真是令人心酸的“高兴”。

现代化的进程，城市化的进程，产业转移的进程，必然造成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随之而来的就是户口的管理。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再想用户口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已经不可能了。大量持有农业户口的人常年生活在城市，已经有机地和城市融为一体。难道我们面临着这些边缘人，还能用户口来约束他们吗？

不论是从人的健康发展来说，还是从经济的顺畅运行来说，原有的户籍制度都显得陈旧，显得与市场经济不大合拍。流动产生活力，树挪死，人挪活，开放式的管理是否更有利于经济的活力呢？既然现有的户籍制度管不了，管不好流动着的人口，已经造成了管理真空，为什么不另想高招儿呢？既然国际上有现成的，成功的管理方法，为什么我们不借鉴或拿来一用呢？

当然，中国人口这么多，三十多年的惯性又这么大，户籍制度牵一发动全身，还要强调循序渐进。有活力又有秩序，这大概可以看作是市场经济对户籍制度提出的要求，也是成千上万的边缘人的呼唤。

总有一天，边缘人会走出边缘状态。这个在中国特定阶段出现的特定概念也会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逐渐消失。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九日

逛俄罗斯市场

带着对俄罗斯市场的旧印象和新新闻，我随'94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展团在深秋来到莫斯科。

展自己的，更要看别人的。趁着布展的当儿，我们提着摄像机直奔商店。首先想看的当然是食品店。前几年，一谈起俄罗斯市场，总爱用“食品匮乏”这样的词儿，那时食品柜台上往往只有面包，长面包还要横着摆，为的是柜台上不显得太空空荡荡。我们走进一家小副食店，看到除了蔬菜品种少、不太新鲜，其它东西完全能满足普通市民过日子的需要。这家商店的女经理出来问：“为什么要看这个店呢？这是最不好的店了。”我们回答：“我们正是要看这样的店。”我们知道，这种开在住宅楼下面的小店遍布莫斯科，最能看出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我们又走进一家大自由市场，这里热热闹闹，很有特色。小商贩友好地向镜头招手。肉菜水果，赤橙黄绿；卖蜂蜜的，开瓶品尝；卖鲜花的，一片绚丽。与前两家不同，新阿尔巴特大街食品店是一家高档食品店，用“琳琅满目”来形容它一点儿也不过分。店堂漂亮，商品丰盈，光肉制品就有二三十种。这里有相当多的商品是进口的，价格不低，但买的人也不少。人们以前看惯了的排队现象，在这里早已不见踪影。

排队的，倒也有，是在意大利皮鞋专营店门口。光顾这种高档店的人这么多，让我很意外。进口商品随处可见，日本的电器、法国的化妆品、德国的皮衣、韩国的纺织品……如果想特意买点俄罗斯商品回去，得专门问一下，一不留神就买了别国的进口货。外商占据了地利最佳的店面，街头的麦当劳人满为患。

面对这样的市场，油然而生的念头是：中国货呢？曾在俄罗斯市场颇为俏销的中国货现在在哪儿？

我们在红场边的百年老店，也是全俄最大的百货商店“古姆”里寻寻觅觅，终于在一处低矮的铺面里找到了中国人开办的卖中国货的小店。店里卖的多是羽绒服什么的，商品摆得很挤，顾客却不很多。威登汉——全俄展览中心，是个中国货扎堆儿的地方，不论是购物环境，还是商品货色，都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那种“亮点”，大都属于中低档。

这样走马观花地逛了市场以后，再看自己的展览就有了新的眼光。是精品吗？符合俄罗斯人的消费需求吗？能代表中国商品的上乘水平吗？经过一番观察、比较和思考，很多参展者都意识到自己对俄罗斯市场估计不足，对自己的展品底气不足。然而，晚了，展览会开幕了，我们不得不让俄罗斯参观者看到了一些地摊水平的展品，而展览会是冠以“中国”之名的。走在莫斯科大街上，我有些难为情。逛来逛去，心里疙疙瘩瘩的。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五日

尴尬的采访

我走进莫斯科的一家百货商店。在秋日里。

身旁是摄像机，手里是话筒，脑子里是一大堆问题：中俄贸易额今年为什么大幅度下降？中国商品在俄罗斯怎么不那么“火”了？’94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莫斯科举办能树立起中国商品的新形象吗？为什么开展几天反应平平？俄罗斯人怎么看中国货？这些沉甸甸的问题当然不是一家百货商店所能回答的，但它们成了我走进商店的心理背景。

这是一家中档商店，当我们正拍摄日本货充斥的电器柜台时，总经理来了，我就势问：“这个商店经营的进口货多吗？”“很多。”我又问：“有中国货吗？”他彬彬有礼：“不，本店不经营中国货。”我有些尴尬，硬着头皮又问：“为什么？”他说：“中国货质量不好。”

尴尬中，我想，该料到会有这样的回答。前几年，中俄贸易红火的时候，中国商品大量涌入俄国市场，一时间，千军万马，鱼龙混杂。注了水的铁皮罐头，塞了稻草的羽绒服，都趁着没规矩的空儿混了进来，钱进了几个黑心贩子的腰包，坏名声却落在中国货上。就像中国人因为晋江假药就不信晋江货，因为温州劣质鞋就不信温州货一样，俄罗斯人上当一次，也不信中国货了。中国货甚至成了劣质产品的代名词，受到抵制。因此，我得到这样的回答，不该意外。

我们正在失去俄罗斯市场——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失去市场有诸多原因，惟自作自受这个原因最让人痛心！三度中国质量万里行，每次轰轰烈烈之后，都要感受一次沉重。良心、道德、规则、法律——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往往比质量本身还沉重。难道我们的质量万里行要延伸到国际市场上去吗？质量万里行不能包医百病，什么能治住病根呢？

失去的，若要重新获得，要付出加倍的努力。这次到莫斯科参加’94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的都是大公司，人称国家队。要重新获得俄罗斯市场，国家队当仁不让。这次在莫斯科，他们是参展者，又何尝不是考察者？每一个在1994年来俄罗斯市场看过的中国人都会获得新印象、新认识，这种考察的意义甚至比展览的意义还要深远，它会带来觉悟，带来调整，带来转机。

在莫斯科，我接触了不少长期在俄罗斯工作生活的中国人，他们最了解俄罗斯市场的变化，最清楚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与他们交谈，便能感受到他们的焦虑和清醒。我问大使：“面对俄罗斯变化了的市场，您给国内经济界企业界什么忠告？”他没有一点迟疑：“不要短视，要有长远眼光。”说完，他转身走远，留给我一个意味深长的背影。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又见北大荒

久违了，北大荒。

第一次走近北大荒，我还是个中学生。当时我姐姐他们那些老三届在北大荒成了生产建设兵团战士，每次来信的信封落款都是“铁字某某某信箱某某分队”。铁，是当时兵团四师的代号，黑龙江兵团六个师的代号连起来的便是铿锵有力落地有声的一句话：建设钢铁边疆。

姐姐当时在信中常提到一个词：屯垦戍边，我觉得很新鲜；那个“铁字”，也很有些神秘的意思，于是在一个暑假，我便去了那个“铁字”——密山。在那里，我认识了另一种形象的姐姐，认识了姐姐的战友，北京的，上海的，天津的，后来我才知道，像他们那样的知识青年，北大荒有五十万；我还认识了姐姐的老排长，那是五十年代的山东转业兵，他媳妇是四川支边青年，后来我才知道，像他们这样的先驱者，在北大荒有三十万。就是他们这些人，把茫茫沼泽荒原变成了三千万亩黑土地，变成了全国最大的垦区。在完达山下姐姐的连队，我第一次见到康拜因，第一次感受到大农场的味道。

后来，大批知青返城，“铁字”也消失了，留下来的北大荒人说，“可把我们闪了一下。”闪，是东北话里很传神的词。换个词儿，怎么说呢？措手不及？失落？慢慢地，听不到北大荒的什么消息了，北大荒显得有些沉寂。

再后来，听说北大荒恢复了元气；听说北大荒提出二次创业，再造辉煌；听说由一百零三家国有农场组成的现代化粮食生产基地已经很有模样了。

再再后来，我又去了北大荒。算一算，距第一次去那儿竟有二十多年了，这也叫阔别之后的再见吧。

夏至时节的北大荒，真让人眼睛舒服，到处是绿，漫山遍野。小麦、大豆、水稻、玉米，各有各的绿，孕育着不久后的金黄。地里见不到几个人，进口的先进中耕机轻松地穿梭，闲下来的农机具停放在家庭农场的小院里。

偶尔遇到个把留下来的知青，他会给你看他承包的侍弄得挺好的水稻田，除了口音，知青的影子已荡然无存。在农场场部的旧办公室外墙上，依稀留着“屯垦戍边”的字样，记录着曾有的那个时代。

在今天的北大荒，已见不到过去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人们变得实际，冷静。谈起农垦制定的本世纪内实现百亿斤商品粮的目标，他们会把根据一一道来；谈起北大荒的闹心事，他们也不焦躁，深深的忧虑里透出能承住事儿的成熟。

又见到的北大荒，是成熟了的北大荒。

一九九五年七月

北大荒承载着什么

这次又见北大荒，感觉和二十多年前不一样，是我老了，还是北大荒老了？互相见了面，那种感觉是沉甸甸的。

北大荒确实已经不年轻了。开发四十多年，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它很有些疲惫的样子。粮食越交越多，负担也越来越重。不知不觉间，已是拉家带口，步履艰难。如今，开发北大荒的第一代人已经纷纷离退休，他们为这片土地，“献了青春献终身”，成了北大荒的第一批老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孩子的孩子正在出生、长大，他们要上学，要住房，要比父辈更好的生长环境，于是，老老小小，农垦成了一大家子，成了一个小社会。

小社会的形成有历史渊源。北大荒原是没有入烟的荒原，开发使这里有了人群。有人群，就有了社会需求，衣食住行是最基本的；接下来，医院、幼儿园、学校、邮局、商店；再下来，警察、电视台、银行……慢慢地，什么都有了，小社会运转起来了，成了农垦的一部分。

细想起来，这部分本该谁来管呢？农场是企业，企业经营要交税，税里有一部分就该是政府用于基础建设、社会事务的，然而，农场没有得到这部分返还。多少年来，他们一边交税一边自建家园，他们说，我们的负担是双重的。

要问北大荒承载的这个负担有多重？一个农场场长告诉我，他要用三分之一的精力去对付生产以外的事情。一位农管局长告诉我，光是老人孩子，也就是养老基金和教育资金，每亩地就得担负二十五元。

北大荒的沉重感不仅是昨天留下来的，更有今天要面对的。

北大荒的国有农场曾是计划经济很彻底的地方。哪块地，种什么，都有指令，国家拨钱拨种子拨化肥，农场交小麦交大豆交玉米。国家拿钱，农场种地，这种关系稳固地实行了几十年。然而，现在，老农垦遇到了新问题，市场经济来了，计划经济还没有走，就这么掺和着、交错着，倒让农垦着实遇上了没遇到过的难事。交粮食，是计划经济方式；买生产资料，是市场经济方式，里外一算，农场的负担又多了一重。然而，谁叫咱是粮食生产国家队呢？黑龙江农垦给负重的自己又加上一副重担：本世纪末实现一百亿斤商品粮。

到底是北大荒，到底是北大荒人。

告别北大荒，农垦人很郑重地授予我一枚纪念章，那是大豆的颜色，小麦的颜色，玉米的颜色，金灿灿的，上面刻着四个字：北大荒人。这将是我最珍视的。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四日

闲话闲说崔永元

曾与大学生们聊天，他们，特别是女生们希望我谈谈他们所关心的几位男主持人。当谈到崔永元时，女生男生都会意一笑，一个个变得眼神柔和，表情放松，饶有兴致，好像我提到的是他（她）哥。

崔永元的确有股“自己人”的劲儿，在他面前，人们不知不觉就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实话实说》的办公室，推门随便进，他也并没有极热情地说：“请坐！”“喝水”，可你会很舒服的坐下来随便聊聊。我没有见到过小崔一本正经坐在办公桌前的样子，倒看他经常处于聊天状态。他的同事一个比一个年轻，还有两个外国小伙子，不知是实习，还是考察，还是打工，如果别的部门有俩老外，就有点奇怪，小崔旁边，有谁都挺正常。观众一进《实话实说》演播室，就被撩拨得想说话。自己会说话，也许不算什么，引得别人想说话，这是主持人的功夫。那天，我爸我妈去看《实话实说》录像，看到屏幕下的小崔，原本就觉得近乎，这回更不见外了！我妈亲热地用手拍着小崔的后背，眼睛炯炯发光：“我们都喜欢你！”这情景让我想起很久以前，我弟弟当兵回家时，我妈就曾一边拍着儿子的后背一边说：“这小子！”小崔的亲合力不分男女老少，我们台的阿美就说出了很多女孩子对崔永元的感受：当水均益走来，自己急忙理理云鬓，整整衣衫，心里念叨，我怎么没有柳叶眉，怎么没有杏核眼！而崔永元走来，自己该在沙发上歪着还歪着，该大口吃回锅肉还吃回锅肉，小崔笑着，就像没看见你的皱纹你的雀斑，这时，你会随随便便地说：“哥，你笑啥呢？”

小崔的笑有点儿特别，那笑里边有不少内容。有时分明看到他宽厚的笑容是在鼓励人家说话，可人家一说出来，你才觉得那笑有点儿不怀好意。当那个意大利女郎在《实话实说》里用无声的口形“说”出北京球迷的京骂时，小崔就是这样笑的。

让人动心的还不是小崔的笑，而是他的哭。在主持《父女之间》时，看得出小崔在抑制自己的感情，他的眼圈红了。在《继母》那期节目里，当眼泪就要流下来的时候，他低下了头，他转身擦泪的镜头后来被编辑删掉了。那忍住的泪，倒让我掉下泪来。男儿有泪，也挺感人的。有意思的是，小崔哭时，让人觉得他挺好，而小崔笑时，倒往往让人觉得他有点儿坏。

现在经常听到各界人士谈论小崔。有一位说话特别刻薄的记者在对众主持人一顿褒贬之后说，崔永元“让说话回到平常”。那位自己不笑专让别人笑的葛优被问到“有没有你看得上的主持人”，葛优沉思片刻：“嗯，有。有一丫姓崔的，根本不像丫主持人哪！”话是糙点儿，那名词的“前缀”可能是葛优对喜欢的人的呢称吧！有一电视资深专家说，小崔刚出来，看着好像哪儿不对，有点儿痞，可又总惦记着到了星期天看他，越来越想看他了。这用行话来说，就叫观众期待心理。

也许是自己越没有的，越喜欢，对小崔的主持我就是这样的感觉。看小崔录像，那是一乐儿。有几次，我不把自己当外人地坐在观众席上看小崔如何实话实说，忽然有一次听到导播对摄像说：“别把敬一丹拍进去，‘穿帮’了！”我这才意识到我在这儿碍事儿，导播一定是怕观众不解：怎么《实话实说》里出现了一张《焦点访谈》的脸？可我还不甘失去找乐儿和学习的机会，有时就到机房里或摄像照顾不到的地方去看。每当小崔说出什么妙语，我就会觉得自己挺不会说话的。比如一下岗女工说，再找工作得挣钱多点儿，

离家近点儿，小崔接茬儿：“那得让工厂搬得离你家近点儿。”同样的理儿，我准得说成这样：“面对再就业，是我们去适应环境呢？还是环境适应我们？”显得事儿事儿的。难怪人们有这样的印象：一看《焦点访谈》的几张脸，出事儿了；一看崔永元的脸，这世界上其实没什么事儿。

小崔这种举重若轻的能力可不是一日之功，也不是灵机一动。十年前我刚认识他时，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记者，当时我去调研这个正火的节目，人家拿来一批优秀稿件给我，其中一个系列报道很醒目，写的是西北边关的事儿，很大气，很人性，很正经，很漂亮。稿笺上作者一栏，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崔永元。

不过，今天《实话实说》的崔永元和昨天《午间半小时》的崔永元很不一样了。

到底是《实话实说》成全了崔永元，还是崔永元成全了《实话实说》，探讨这个问题，就像探讨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六日

我的话筒

第一次知道这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话筒，是在读小学的时候。那时，老师从我们班挑了几个同学对着话筒念了一段课文，老师说，话筒也叫“麦克风”。后来，选中了一个叫梁晶的女生到广播室当广播员。以后，每到课间，梁晶就离开了教室，过一会儿，教室的小喇叭里就传来梁晶那柔和的声音：“同学们，请准备好，和我一起做眼保健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我常常是一边揉着眼睛，一边琢磨那是梁晶又有点儿不像梁晶的声音，想像她面对话筒的样子，暗暗羡慕着她。

后来，“文化大革命”了，停课了，眼保健操也不做了。梁晶后来学唱歌了。

第二次见到话筒是在中学。我的中学就在我的小学前边。中学管广播站的马老师走到后边的国庆小学问：这期升入四十四中的学生谁朗诵好？恰好问到我的小学老师郭清泉，郭老师就推荐了我和朱庆和，于是，我们就成了四十四中广播站的播音员。我们经常是这样开头的：

敬：哈尔滨市第四十四中学毛泽东思想广播站——

朱：哈尔滨市第四十四中学毛泽东思想广播站——

合：现在开始广播！

敬：首先学习最高指示。

朱：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记不清在那红楼三层的广播站里，我念过多少大批判稿，喊过多少激昂的口号，记不清在那面对操场的两个大喇叭里，还有串联在几十间教室的小喇叭里，我播出过多少自己也不懂的话。

又见话筒时，我已当了知青。盖房子的工地需要建一个临时的广播站，却不知谁能当广播员。这时有人告诉队长：敬一丹在中学当过广播员。于是，我就被选上了，那个广播站设在工棚里，颇像电影《雷锋》里的那个场景：工地上，人们在添砖加瓦，大喇叭里喊：同志们，加油干啊！

房子盖好了，广播站也撤了。正在我失落的时候，山上新胜林场新建了广播站，我就被推荐去了。

新胜广播站的话筒是崭新的，是上海无线电厂生产的，底座是让人愉快的浅蓝色，话筒上包着一块红绸子。那小小的广播站是我五年知青生活中最喜欢的地方。每天，当小电站的井东元师傅轰隆一声发起电来的时候，我就打开 150W 扩大机的低压开关预热，半小时后，再开高压。接着放唱片，是 78 转的《东方红》，然后，音乐渐隐，话筒渐开：“新胜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先播送营林段韩凤菊写来的广播稿……”然后：“现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这时，可能有人把门推开一条缝：“小敬，给我们来一段二人转吧”于是，我就在节目表里预定的文艺节目时间里，放一段二人转的唱片，还有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什么的。全林场百十位听众全是熟人，一位大姐告诉我，家里早上从不看表，听广播一响就起床，你要是起晚了，我们全得晚！知青伙伴告诉我，我们在山上听广播，听不出是你播的还是省电台播的。我暗自得意，故作平静地说，是我播的。

那段时间，我是完全彻底的采编播合一，干得极充实。后来，局里在我们新胜林场开广播工作现场会，我在会上介绍我是怎么办广播站的。之后不久，我就被调到局广播站了。我是哭着走的，我爱上了这个小广播站。那朝

夕伴我的话筒交给了我的下一任播音员韩凤菊。

清河林业局广播站有不止一只话筒，不止一个播音员。这里站长、编辑、播音员、技术员，按部就班。当然，播出的东西也不仅仅是好人好事和二人转了。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了广播稿里还分为消息、通讯、评论。后来，我兼了编辑，我写的一位老党员让房的故事不仅在本站播了，还上了《黑龙江日报》，那时，也没有稿费一说，人家给了我一本《新来的小石柱》作为鼓励。那时，我在话筒前说了些什么呢？印象最深的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春季造林大会战、护林防火、冬运任务完成了、不要烧好材，要烧枝丫，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后来，我真的变成省电台的了。大学毕业后我在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当了五年播音员。记得第一次在话筒前播的是天气预报，播得极郑重，还特意组织爸妈收听。在话筒前，我喜欢播知识节目、电影录音剪辑、文学欣赏，最怕的是播送早上的新闻，往往新闻播完了，我还没醒透呢。

那时，电视初起，人手不够，组织上命令我到黑龙江电视台客串。当时，我对电视有一种排斥，觉得让人品头论足的，算是个什么职业呢！白天，我在电台的话筒前说：“各位听众”，挺有感觉的；晚上，我在电视台的话筒前说：“各位观众”，一点儿感觉也没有。我整天磨领导：让我回电台吧！领导告诉我，电视台新人成长起来以前，你得顶着。

那时的电视可真是初级阶段啊，拍出来黑咕隆咚的。当时，我和我先生刚认识不久，有人问他：“听说你女朋友在电视台？”

“没有没有。”他总是耻于承认。

人家指着电视里的我：“是她吗？”

“不是不是。”

“我想也不能啊，咱哥们儿怎么也不能找那么大岁数的，有四十了吧？”

其实，那时我年方二十四。

当时我固执地认为，广播是最正宗的，电台、电视台一个大门出入，可电台的人看电视台，那眼光有点儿像国营大厂看乡镇企业。

可后来，那乡镇企业十分了得，电视高速旋转，我不知不觉被吸了进来。走进中央电视台，已经和话筒相伴了十年。话筒似乎变成了有生命的东西，我要说的，它给传播出去了；我听到的，它也听到了。它和我一起走近百姓，走进大千世界。最偏远的地方，最堂皇的地方，最平常的地方，最热闹的地方，它都去过，都是一样地做它该做的。它听到过千言万语，但它总是默默的……

当我有了三个“金话筒”时，我知道，获奖三次以后就不再参加“金话筒”优秀主持人评奖了。我更知道我离开的只是金话筒，我离不开真的话筒。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